

# 以中華文化的深廣氣派應對文明衝突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中美貿易戰持續至今，美國不斷發言批評及增加壓力，中國則溫和而堅持不屈。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國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依據一九七四年貿易法第三〇一條，指示美國貿易代表（USTR）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關稅，涉及的商品達六百億美元。之後日漸激化，九月十八日，特朗普宣佈對二千億美元中國產品增加百分之十的關稅，將在九月二十四日實施。在二〇一九年一月一日，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關稅。

美國以為中國會因為有所損失，將在壓迫加碼後就範。但他們完全不明白近代中國是歷經長年苦難與外國欺凌，故中國人很重視尊嚴，強國霸凌到了底線，就絕不退讓。當年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步步進迫，欺壓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打到北平附近，中國就全國抗戰毫不退讓。中國人是不怕艱苦的，不懼怕貿易戰使利益小一點，民族文化的尊嚴更重要。

其實貿易戰產生所有的對立，都是雙輸的，中國知道只要堅持下去，美國缺乏能耐打長久戰，其失去利益的工商農必會向政府施壓，而終會減低不合理要求，中國只要作些微讓步，讓特朗普很體面地宣佈勝利，或許可以完結這次兩敗俱傷的對壘。

但即使貿易戰完結，中美仍會對立，關鍵在美國不能承受中國以其特有模式興起，不跟西方之路。歸根到底這仍是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1927-2008)所謂的「文明衝突」，一九九三年他在《外交季刊》上發表《文明的衝突》文章。一九九六年拓展為一本專書，取名為《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在冷戰後西方以為已完勝世界，建立全球化以西方主領的新秩序，甚至一九九三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歷史終結，認為世界已出現了共識，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是最好的模式。但亨廷頓卻指出，今後國際間的衝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主要在各大異質文明之間（或內部）的爭鬥，文明之間的斷層線正在變成全球政治衝突的中心地帶，且會形成社會暴力衝突。除了預言伊斯蘭教與西方抗爭外，也預言中國的崛起將會導致與西方文明的衝突。其書出版後五年，九一一事件發生，似乎亨廷頓之預測發生了，美國因此攻滅阿富汗與伊拉克，結果反恐戰爭打得美國筋疲力盡。

初期我們認為中華儒學文明是和諧與寬容的，不會和西方衝突，中國在這發展成功的時期很努力建立和諧共贏的國際氛圍。但美國與西方對中國開始強大仍是難以釋懷，因為中國沒有跟從西方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模式，卻發展另一套中國特有的模式，及用中國文化的價值觀來引導。西方好些專家都預測中國不走新自由主義必然失敗，但出乎意料地西方經濟產生危機，中國卻仍是空前成功，且在科技與經濟上漸追上西方。美國作為世界霸權多年，很難接受不跟其路線而能成功的案例，怕全球發展國家跟中國之路，美國就失去領導地位。但中國又無戰爭與暴力衝突的傾向，故用不流血的貿易戰爭，希望能制止或拖慢中國的成功，形成今日的對立處境。

一九八九年，由於拉丁美洲各國家陷於債務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

(WBG)、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以及拉美國家代表在華盛頓召開了研討會，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曾任世界銀行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寫了《華盛頓共識》(英語：Washington Consensus)，是一整套針對拉丁美洲和東歐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推動金融和貿易自由化外資進入自由化、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同時要求政治配套，是在推行多黨民主及三權分立體制。說白了，就是西方企業可自由進出落後國，影響甚至操控當地經濟和資源，並且可政治上發揮影響，使其親近美國及西方。

二〇〇二年，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著書*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揭露華盛頓共識，提到美國要求金融市場自由化，不會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只會促進美國金融利益集團的狹隘利益，美國財政部就是這個利益集團最堅定的代言人。

美國以此方向要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希望影響中國走同樣的路，但中國卻走出自己的不同方向。中國的成功，在改革開始以來以集體領導聚合各方人才，檢視全體發展的各方面，謹慎部署策略，開放自由市場，開放特區，引進投資，提供大量勞動力去生產，但又在體制上設計使外國強大的集團不能操控中國經濟。發展時用鄧小平「一部份人富起來」的理論，即義大利經濟與社會學家帕累托(pareto)的帕累托最優法則(Pareto Optimality，或Pareto Efficiency)，以資源配置的改進，使整體中的部份先改進，當一群固定的人可分配一資源，從一種分配狀態轉變向另一狀態，最優的配置是在沒有使任何參與者處境變壞的前提下，至少使一參與者變得更好。只要一個改進開始，一些人改善境況，社會福利總量能上升，結果將帶動整體，逐步從均衡發展而使各方得改善。先是中國特區發展，到沿海各地，到上海浦東，是以中國百分之二十地區，創造了百分之八十財富，再用這百分八十財富開發中西部，帶動另外百分之八十地區進步。在一個高效能政府下，通過「全國一盤棋」而使發達區與落後區互通，互動，互助，而達至成功。發達區資源流向落後地區，使其增長。落後地區又提供龐大人力資源，供發達區發展。

中間形成貧富不均，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等困難。但在發展到整體不錯基礎時，政府即可調動資源，發展城鎮化，將發達地區資金流入落後區，使之繁榮起來。再加上精準扶貧，企業善用農村資源，改進農村收入等，即使貧困村安定下來。

這一切的思維來自中華文化，是易學的整體互動互補思維，西方是按抽象邏輯的直線思維，重程式，規則，時間系列，工具理性，中國卻是按易經思維，重整體，事件，關係，和諧，人性感通。中國處事和政策，是在整體全面的發展中，觀察變化的每一處境，尋找其平衡的理則，平衡點在陰陽兩極變化中移動，在發展中不會成一直線，也不會一成不變，卻按大方向前去。故中國是在開放與收緊中前進，而逐步走向更開放。

中國的成功是以數千年中華文化為思想條件，再吸收西方文化一些優秀的價值而成功，西方文化是不可能取代中華文化的。不同文明本不必然要衝突，只要學會互相欣賞、互相學習、互相借鏡、互相吸納，自可相得益彰，而達共贏。

今日世界最可怕的是民粹主義，極左極右的思想都極具拆毀性，美國以右翼民粹主義對中國，中國若以左翼民粹主義回應，就必成冷戰而生不必要的衝突。中國一方面須以實力回應，使美國明白霸凌終會使自己受害。另一面卻可向世界展示中華文化的深廣氣派與智慧，不從仇恨對立，反而以中國文化的仁愛和諧，吸納西方一些優秀價值，如商業講誠信，行政講效率，教育重創意，在高層文化價值上吸納無條件的大愛與自我犧牲精神，這些價值在中國文化中也有類似觀念，吸收與融合去建立崇高道德，壯大中華文化內涵，建造新時代中華文明，對其他文明既包容又超越，同時和而不同。以此發奮圖強，達至物質與精神上的同時富強。